



林徽因在药王山考察。

作为强者的林徽因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与世长辞，享年51岁。说起林徽因，大家都不会陌生，即便不了解她的卓越成就，也一定读过《你是人间四月天》，听过她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的情感故事，或关注过她名门望族的家世、倾国倾城的容貌。今天，我们除去那些“花边”色彩的内容，来谈一谈真实的林徽因，作为强者的林徽因。

□何龙

建筑大师

林徽因的“强”首先表现在专业领域——建筑。她立志奋斗一生的事业是建筑学，以至于墓碑上只刻着“建筑师林徽因”。1924年，林徽因、梁思成一起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便注册在美术系，以选修的方式完成建筑专业学习。

1928年，夫妇学成归国后到东北大学任教，东北大学的校徽图案即由林徽因设计。

1931年回京，二人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此后数年中，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对190个县2738处古建筑进行了调查，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得以再现真容。

1946年，二人回到阔别十年的北京，林徽因主导开办了新的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二人编出《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致力于古建筑保护事业。此后，林徽因完成新中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规划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格局，而她本人也长眠于此。作为中国杰出的建筑家，她尽其一生为中国建筑的研究、保护、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建筑学的研究、教育事业创下了不朽功勋。

家国情怀

林徽因的“强”也表现为强烈的家国情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林徽因、梁思成先迁天津、长沙，后到昆明、四川，同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过着颠沛流离、贫病交加的艰苦生活，在最艰难的困厄中，林徽因一方面为生计而奔波，一方面保持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傲然风骨，山河破碎之际，她更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凭借着高度的责任感、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倾力为《中国建筑史》的编撰收集整理素材，在她的全力支持下，梁思成得以完成这部著作，将中国古建筑研究事业推向了一个高

生命强音

林徽因的“强”还表现在个人气节方面，作风一贯顽强而坚毅。少年时，父亲去世、家境生变，得梁启超之助才得以赴美留学，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兼顾生计与学业。工作中，她与梁思成风餐露宿、翻山越岭，骑着毛驴寻觅古建筑，亲登长梯测量，甚至仅以凉水充饥。

抗战中，她保持着对艺术的热爱，醉心于阅读和文学创作，作品中表达着对祖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关怀，超越了苦难与死亡，流露出胸襟抱负，彰显着生命的高贵与尊严。新中国成立后，就北京城市建设与古建筑保护的问题，坚持己见，尽显卓然风骨。

由于战乱中辗转各地，衣食难以自给，林徽因患上肺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日趋恶化，回京后得以系统治疗，病情才有所好转。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她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拖着病体致力于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在她的努力下，这一项国宝级的民间工艺得以留存，成为享誉世界的工艺瑰宝。林徽因却因之积劳成疾，病情再度恶化，直至溘然长逝。林徽因的外表温婉，骨子里却个性鲜明，坚定从容，保持尊严，她步履坚定，负重前行，唱响着生命的最强音。

除却杜撰因素，抛掉个人情感，我们该从客观角度去了解林徽因绚烂而真实的一生，认识一个立体、鲜活、多面的林徽因，感悟一位伟大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和生活姿态。

据“中华书局1912”公众号



林徽因与梁思成

1921年10月，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安特生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1926年10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举起了铲子”，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进行的现代考古田野发掘工作，因而李济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一个时代，两位考古“之父”，在揭开中国早期文明面纱的同时也有了认识上的碰撞，在认识西阴村发掘材料的过程中，还见过一面……

□袁莉芳

曾经失之交臂

1923年秋，李济在哈佛大学取得人类学博士学位毕业回国，也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时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据李济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他鼓励我做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之后也正是在丁文江的鼓励下，李济在自己的国家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考古。

1926年2月，李济选择在“治安状况相对较好，考古资源丰富，史籍中载有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坂、虞都在安邑”的晋南开始考古调查，并于3月24日发现了西阴村遗址。

同年10月15日，李济与袁复礼在西阴村的“灰土岭”开始了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此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安特生正在陪同对中国非常感兴趣的瑞典皇储，于10月16日至11月18日在中国进行着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术交流，梁启超、丁文江、章鸿钊等知名学者都出现在了欢迎会上，行程包括辽宁、山西、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在山西因为“道路不靖，只好到太原附近的两个石器时代遗址作了象征性的考察”，并没有到夏县西阴村。因此，“王储的这次学术交流活动，李济与袁复礼未能‘躬逢盛会’”。两位考古“之父”虽然同在山西但没有见面。

李济的“申谢”

在西阴村的发掘中，李济采用了“探方法”，挖出的探方是2米×2米的，在处理探方的时候首创了“三点记载法”“层叠法”，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曾评价：“李济的第一次发掘是相当科学的，它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的较高发掘水平。”这次发掘出的陶片超过了10万件，另外还有石器、木块、骨器，以及半个蚕茧。

毫无疑问，李济及当时的国内学者对这次发掘成果是极为肯定并且兴奋的。因为早在1921年安特生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发现了仰韶村遗址，后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在袁复礼等人的参与下发掘该遗址，收集到十余箱的出土物，安特生将出土的彩陶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进行比较，于1923年正式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安特生沿丝绸之路对甘肃、青海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果真在马家窑发现了新的彩陶文化遗址，在洮河西岸发现了齐家遗址。他还认为：“彩陶绚丽的马家窑文化应该晚于齐家文化；马家窑彩陶比仰韶彩陶发达，更接近西方彩陶。”1925年安特生在《甘肃考古记》中将甘肃古文化分为六期，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期，后来的考古证明了这种分期不准确。

面对这种观点，李济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专刊》中写道：“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可见，几年之后西阴村遗址的发掘为当时的学术界注入了巨大的能量，正如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所写的发掘动机就是：“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这也是两位未曾谋面的考古“之父”在认识上的交锋。

那么，两位先生后来到底见过面吗？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明确提道：“……安特生最初叫我注意这一点，特此在此申谢”，还有“安特生告诉我说，他向来没找着过这样的箭头”。可见，会面确确实实是有。

会面过程推测

什么时间见的面？在哪见的面？就需要从时间轴和行程上来分析了。瑞典皇储在1926年11月18日自上海离开中国。之后，安特生帮助步达生实现了在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计划，1927年4月16日周口店遗址发掘正式启动。李济和袁复礼1927年1月10日回到北京。4月25日，安特生即将离开中国，丁文江在北京顺利饭店设宴送行，同席的还有斯文·赫定、巴尔博、德日进、谷兰阶、葛利普、步达生、翁文灏、金叔初、李四光等，这些都是为中国的地质工作和考古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内外学者。根据现存材料显示，宴会名单中没有明确提到李济在场，在此我们不多加猜测。

从上述时间可知，1927年1月10日至4月25日这段时间，李济、安特生两人均在北京，又同为考古人。李济对西阴村遗址出土物充满热情，迫切想揭开它们所要传递的历史信息，相信安特生也是如此。两人还有一个共同好友——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丁文江对李济和安特生的考古工作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岱俊在《李济传》中甚至认为“丁文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另外，袁复礼也非常重要，不仅与安特生一同发掘仰韶遗址，还与李济一同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些主观及客观的存在，都是二人会面的有利条件。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写道：“分析全体陶片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发现新的种类，但是我们相信那紧要的都已名列了。我们没找到刻纹的陶片，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几种陶片初看极似具有刻纹，我最初也以为如此。但是用着较强的放大镜看，那细的绳印就显出来了，凡是我起初以为是刻纹的都是绳印的……安特生最初叫我注意这一点”，还有，“有好多很整齐的石箭头，大半是燧岩作的，也有石灰岩及骨头作的。燧岩作的尤为整齐，有十个整个的。它们的形状虽不一律，但是大概是属于一个统系。安特生告诉我说，他向来没找着过这样的箭头。他的报告中所叙的箭头是由页岩、骨头或贝壳作成的，它们的形状也不同……那三瓣形的骨头箭头与在安阳找出来的完全相同”。可见，两人交谈的内容具体到了西阴村遗址出土物的器形、材质、纹饰、类型等方面，另外还将西阴和安阳的出土物作了详细对比。这些都是需要亲眼见到实物，并仔细观察与分析，才能得到的结论。会面的地点显而易见，一定是清华了，因为西阴村遗址出土物运到北京之后就保存在清华。因为这次会面李济对西阴村遗址出土物有了新的“注意”。两位考古“之父”的这次会面，不再是认识上的交锋，而是认识上的切磋和交融。

(据《大众考古》)

两位考古“之父”究竟有没有会过面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马纯潇 组版：刘燕